



跟随父亲李光华追忆香山慈幼院

□李虹

我亲爱的老父亲李光华于2012年2月18日仙逝，享年89岁。他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的次子。叶落归根，我们把老父亲留在香山脚下，那里有我的祖父母、伯父和姑姑，父亲在那里该不会寂寞。

在从八宝山送别父亲回来的路上，看着连绵起伏的北京西山山脉，回忆起儿时父亲带着我们在香山、碧云寺、卧佛寺、樱桃沟、八大处、温泉、冷泉山中游玩，在漫山遍野的疯跑中度过的每一个快乐周末时不胜唏嘘。

1960年，我随父母工作调动来到北京。那年我4岁，4岁正是记事的年龄。所以，我的记忆是从北京开始的，最清晰而又形象的记忆是香山。

4岁，我第一次登上香山主峰“鬼见愁”。在盘旋的山路上，我受到游客们无数次的表扬。这大大地满足了我懵懂的虚荣心——爱山，从此开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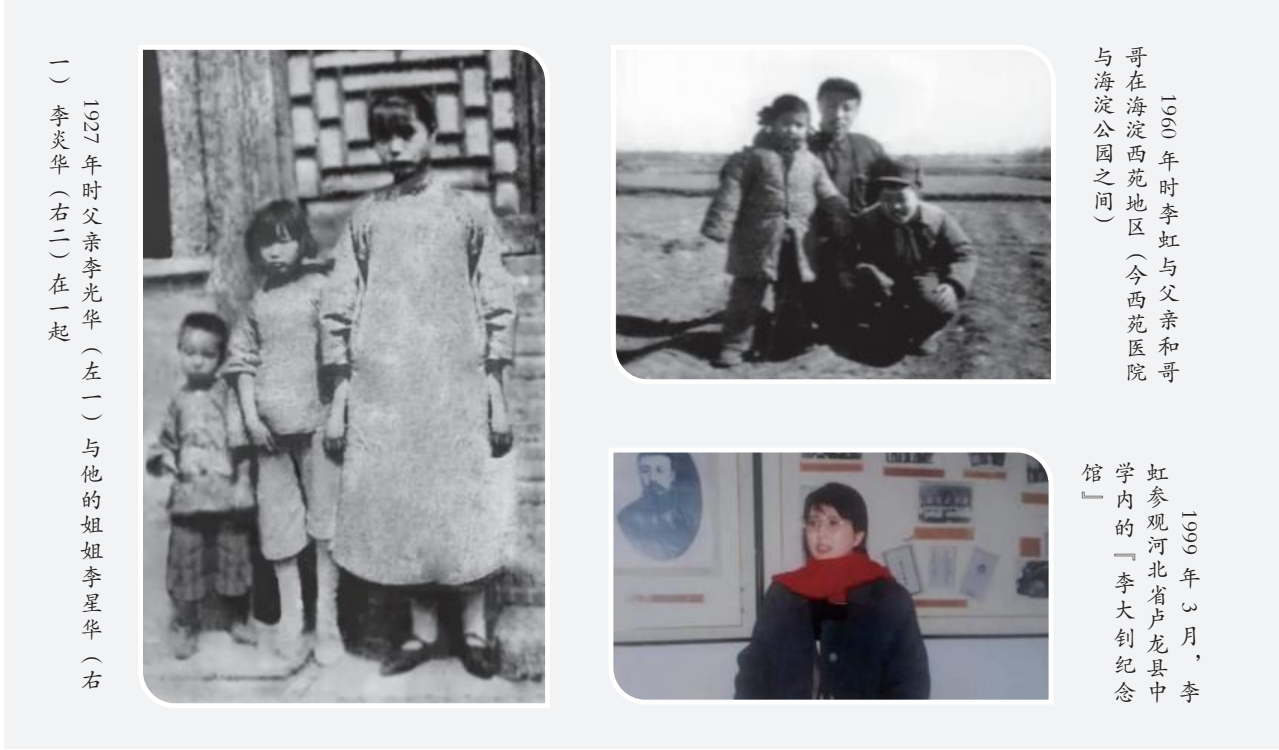
而对香山的热爱则是从香山慈幼院（简称香慈）开始的。因为父亲的介绍，香山脚下的香慈校舍部分是我的西山记忆中最为丰富和难忘的部分。

记得儿时进香山公园大门之后常走的是两个方向——以勤政殿为始发地，向左是去攀登“鬼见愁”，向右是看香慈校舍，看眼镜湖。每当向右方向走过一段小弯路后，一片片建筑展现在眼前。这时父亲就会指指点地点告诉我：这是男校……这是女校……那是蒙养园，你叔叔在蒙养园住过。这些已经有些破败的建筑和绿色油漆已经开始剥落的门窗，都让我对父亲眼中的香慈产生无限的遐想。香慈男女两校宿舍以校训“勤、谦、俭、恕、仁、义、公、平”命名。男生编勤、谦、俭、恕四村，女生编仁、义、公、平四村。记得有一次父亲对我说：“醒村住的都是夜里尿床的学生，我也住过。”我好奇地问：“您尿床吗？”他说：“我不尿床，可是不知那时为什么安排我住在这儿……”父亲在香慈虽然仅仅3年，而这短短的3年却对他的一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1927年，祖父李大钊就义后，祖母带着几个年幼的孩子回了故乡河北乐亭。父亲在乐亭老家读小学。毕竟，我的伯父和姑母都曾经在北京孔德学校读书，而农村教育和北京的教育差距之大是非常明显的，一贯重视子女教育的祖母心有不甘。

1934年，经过多方联系，在饱经颠沛流离之后，父亲和他的弟弟（即我的叔父）李欣华一起作为正生进入了香山慈幼院学习，开始了他们一生中最为快乐的一段生活。

香慈，对于父亲来说，不仅仅是在接受高水平的正规的小学教育，而且它的教育理念、师资力量、周围环



1927年时父亲李光华（左一）与他的姐姐李星华（右一）李炎华（右二）在一起

1960年时李虹与父亲和哥哥在海淀西苑地区（今西苑医院与海淀公园之间）

1969年3月，李虹参观河北省卢龙县中学内的「李大钊纪念馆」

境等对父亲一生都有深刻的影响。酷爱音乐的父亲曾这样回忆香慈的生活：“如果将我的大半生比作欣赏一场音乐会，那么，在香慈的那段生活则是这场音乐会中最优美动人的一章。”

父亲故去后，我经常回忆和父亲在一起的难忘的日子、有趣的事情，以及父亲的爱好和秉性，发现香慈培养了他对文学和音乐的爱好，而文学和音乐带给了他开阔的胸襟和高雅的情趣。香慈使他热爱自然、崇尚运动，更重要的是香慈给了他家的温暖、感情的寄托和精神的归属。父亲的口琴吹得很好，会震音、会共鸣、会模仿手风琴的效果。后来，我才知道吹口琴在香慈二校男生的音乐课上必修的。他说：“当年的口琴都是木质的，吹时间长了嘴会发胀，把嘴都磨破了。”父亲不仅口琴吹得好，歌儿唱得也好，是男高音。在家里、在野外，甚至在行走的路上，随时都可以引吭高歌。他喜欢那种抒情的、意境幽远的歌曲。

每当我们在香山公园攀登“鬼见愁”，途经静翠湖时，父亲都告诉我，那是他们游泳的地方。经过眼镜湖时，他又告诉我，那是他们学滑冰的地方。此时，我的眼前肯定会浮现出一群快乐的孩子，脚蹬简易冰鞋在湖上呼啸穿梭的情景，甚至想象着一个虎头虎脑的男孩笨拙的身影——那就是我的父亲。

我的第一支口琴、第一件泳衣、第一双冰鞋都是父亲亲自为我选购的。口琴是国光牌的，泳衣是红色泡泡纱做的，冰鞋是黑色的。遗憾的是，我的口琴水平永远赶不上父亲，

游泳的水平仅限于不被淹死，而滑冰的成果也仅限于在未名湖上的考试成绩勉强及格……当时的我并没有感觉到父亲为我提供的这些有什么特殊的意义。现在回忆起来，父亲是要将他认为美好的东西传递给我，因为这些都是他记忆的凝结。

父亲在香慈度过了他人生中最快乐的3年。与他凄凉的幼年时光相比，此处使他更感受到了在别处感受不到的温暖。这种温暖不仅仅来自师生之间的温暖，也不仅仅是同学之间的温暖，更令他难忘的是一种胜于亲情和友情的感情——那是一种更深层次的、心灵相通的同志加兄长般的关爱。

袁拙农老师，本名袁鸿业，生于1899年，河北省深泽县北袁庄村人。在保定育德中学初中毕业后考入保定第二师范，毕业后在北京、正定、无极等地教过高小。1935年秋在香山慈幼院任史地教师，因宣传革命于1936年春离开学校。当时，我父亲在读五年级。短短不到半年的时间，袁老师给父亲留下了深刻的印象。60年后，他还怀着对这位老师的深情写下了回忆袁老师的文章。父亲曾经说，袁老师肯定是共产党。他不止一次地对我说，有一次在听袁老师讲中国革命史的时候触动了他们内心最深、最痛的感情，他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眼泪。袁老师走到他身边，抚摸着他的肩膀对他说：“不要难过，要坚强！”在父亲心中，这是一个革命者对革命先辈遗孤的一句发自肺腑的关怀和鼓励。就是这一句话深深地温暖了父亲年幼的心，使他感受到了一种思想的沟通和灵魂的依靠。父亲的感觉是对的。在

写这篇文章时，我上网搜索到了袁拙农这个名字和他的家人在《袁氏家谱》中记录的他的事迹。原来他早在1923年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是受祖父精神影响的共产党人，离开香慈后在中共河北省委任职。40年代初，他在北平等地做地下革命工作。1944年秋不幸病逝，年仅45岁。也许是在香慈工作的时间太短，家中亲属并不清楚他的这段经历。但是从他从事小学教育工作的经历和对革命事业热情如火的精神可以断定，他——就是父亲爱戴的袁老师。我这样想象，如果袁老师能和家父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和平环境中再次相见，那将会是多么感人的场面，他们之间的师生情谊，也是父兄般的情谊，将会绵长而深厚。

父亲在香慈小学毕业，1937年考取了北平当时最优秀的中学男四中。据说放榜的那天他不敢去看，在我二姑的鼓励下鼓足勇气去看录取榜。他是从最后一名往上看，不知道是越看越有信心还是越看越绝望，终于在看到第27名时看到了自己的名字，于是雀跃回家。然而，就在那年夏天爆发的七七事变，使他再也没有机会坐在男四中的教室中学习了。此后他参加了冀东暴动，后又去了延安，走上了一条与自己的设想不太相同的人生道路。

香慈，对于父亲来说是最美好的一段生活；而对我来说则是寄托对父亲思念的地方。走在香慈校园路上的我，联想最多的就是一个小姑娘听着父亲讲当年的故事，这种感觉久久地在心中萦绕，挥之不去……

（作者生前系原中央党校图书馆研究馆员）

要为子孙留什么

□丰家雷

林则徐说过这样一段富有哲理的话：“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则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增其过。”这段名言提醒人们，如果为子孙后代长远考虑，就不要给子女过多溺爱、过多包办代替，把追求积累很多财产留给子女作为目标，这样做是不明智的选择。

给子孙留下很多钱财，看似父母疼爱子女的表现，实则不然，还有可能得到与父母期望相反的结果。历史上有许多聪明智慧的人，都看清了这个道理。如孙叔敖之子请封寝丘之地的故事，就反映了孙叔敖对待这个问题的远见和睿智。

孙叔敖是春秋时期楚国的令尹，他以贤能闻名于世，清廉自守、执法严明、公正无私，司马迁在《史记》中称他为“循吏”第一。孙叔敖担任令尹期间，楚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都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在他的辅佐下楚庄王成为春秋五霸之一。但因操劳过度，孙叔敖身患重疾，年龄不大就去世了。弥留之际，他再三叮嘱儿孙安：“楚王为嘉奖我的功

劳，曾多次要给我封地，我都拒绝了。我死后，楚王如果要封你官，你要坚决推辞，以你的能力承担不起安邦治国的重任。如果楚王非要给你封地，你就请封寝丘之地，其他的肥沃土地坚决不要。”寝丘是一处楚越交界的贫瘠山地，无人问津。果不其然，楚庄王坚持要赐给孙安封地，孙安按照父亲的遗言行事，先是执意推辞，后不得已请封寝丘之地，楚王同意了请求。就是这份请求保全了孙家后世的平安。多年之后，其他人受封赐的土地都没保住，不是被新的权臣霸占，便是被后来的楚王收回，有的还成了两国交兵的战场。只有寝丘之地安然无恙，孙叔敖的后人便能一直在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

此外，魏晋时期许狂后人在苦地安生的故事，也印证了这个道理。公元280年，晋武帝司马炎灭掉东吴，一统天下，开始大赏功臣。许狂在灭吴之战中立下大功，且身负重伤。司马炎带众人前去探望，并许诺京城洛阳周边的肥沃土地任其挑选。闻听晋武帝此言，身边的文臣武将都羡慕不已。然而，令人诧异的是，许狂竟然

请赐凉州之地，以供养老。西晋时期的凉州荒凉贫瘠，是苦寒之地。晋武帝很是纳闷，问他为何？许狂说，自己的子孙没有多少学识和能耐，去荒凉之地正好，请求陛下恩准。过了不久，许狂就带着全家老小去了凉州，过起了农耕生活。

而后，晋武帝司马炎驾崩，儿子司马衷继位，史称晋惠帝，晋惠帝生性愚钝，无视民间饥寒。皇后贾南风把持朝政，恣意妄为，朝堂上乌烟瘴气。天灾人祸接连不断，民不聊生。10多年之后的公元291年，爆发了八王之乱，前后持续16年，皇室子孙几乎被杀光，当初选择京城周围封地的功臣也都遭到叛军轮番洗劫，大多性命不保，境况惨不忍睹，少数幸存者也都流离失所，无家可归。凉州由于偏远苦寒，远离了这场战乱，许狂后人得以在凉州过着平静的生活，而许狂已故去多年。此时，人们才悟到了许狂的智慧。

创业难，守业更难。没有德才做底子，再大的家业也庇护不了子孙平安。孙叔敖和许狂就是清醒地意识到了这一点的人。世上没有人能够为孩子

一辈子遮风挡雨。父母的过分溺爱，过多包办代替，往往会使孩子不懂做事、不明处世，迟迟担不起生活的重担。过度优越的物质条件，极易让孩子产生惰性和奢侈的习气，难以激发自身奋斗的热情和动力。

给子孙留什么？非留钱财与溺爱，当留家风与精神。一个家庭最好的家风就是让孩子们在生活中学会生存、在奋斗中战胜苦难，获得未来幸福生活的资本和底气，能够自如驾驭跌宕起伏的人生。

良好的家风是人生的第一堂德育课，是根植人心的“信仰”，是家族兴旺发达的“基因”，是家族传承最珍贵的不动产。读书明理，勤俭持家，方能过上平平安安、稳稳当当的日子。

给子孙留什么，的确是个大问题，也确实是门大学问！



清忠亮直的南宋名臣陈俊卿

□丁颖 金辉

陈俊卿（1113—1186年），字应求，号六梅，莆田（今福建莆田）人。南宋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被誉为“南渡名宰相”。宋高宗绍兴八年（1138年），陈俊卿登进士第，授泉州观察推官。历高宗、孝宗两朝，官至尚书右仆射、同平章事兼枢密使、左相，在宋孝宗时期是一名重要的政治人物。陈俊卿一生坚持清廉为官，节用爱民，却屡遭排挤几度出知地方，但他始终秉承正义，不附权贵。淳熙十三年（1186年），陈俊卿去世。宋宁宗题写了“清忠亮直”的牌匾来褒扬陈俊卿清廉正直的品性。

清风峻节、刚正不阿。宋高宗时期，秦桧把持朝政十几年，权倾朝野，结党营私。陈俊卿为人耿直，从不阿附权贵。他在绍兴八年进士及第高中榜眼时，就没有按当时惯例，去拜会丞相和权臣。陈俊卿不忘家仇国恨，一直主张对金作战，与秦桧的主和策略背道而驰。秦桧“察其不附己”深感不满，一直打压陈俊卿，直到绍兴二十五年（1155年），秦桧病死，陈俊卿才被召回朝廷，担任秘书省校书郎一职。陈俊卿不参与同僚宴请，也不接受他人馈赠，无论是在地方任职，还是在朝为官，一直秉公正直，廉洁节俭。福建莆田陈氏家风十分严谨，陈俊卿深受影响，只结交志同道合的良师益友，他在当时与朱熹、林光朝等理学家私交甚笃。陈俊卿生活十分俭朴，史书中记载“自奉甚约，食日一肉，而一衣或二十年”。在南宋时期，一由于社会经济相对富足，二来很多官员都常常谋私贪腐、聚敛财富，所以他们死后都为子孙留下万贯钱财、良田屋舍，《宋史》中形容“百姓膏腴皆归贵势之家”。而陈俊卿留给子孙的只有一首《示二子》，他在诗里写道：“遗汝子孙清白在，不须厦屋太渠渠”。诗句简洁直白，就是要告诫子孙，生而为人，身外之物根本不重要，重要的只有一身清白。

举善荐贤、指佞触邪。在南宋时期，官员的选拔任命有三种方式：科举、任子、推举。科举制度相对公平，而任子和推举有很大的主观因素。当时朝中不少官吏私德不修、不学无术。陈俊卿反对举荐不正风气，向宋孝宗推选了很多品行俱佳的官员。他推荐的原则不是为己所用，不是为了巩固自身的势力和地位，推选官员不看中个人家世，而更在乎官员自身的品德和才学。他还劝诫宋孝宗要知人善用、稳固朝纲。陈俊卿多次推举杨万里、张浚、朱熹、虞允文等有才学之人。虞允文主张积极对金作战，一心想收复中原。而且有勇有谋，赢得了“采石大捷”，后又收复巩州。他在任四川宣抚使兼知枢密院事期间依旧心系收复大业，积极整顿军队，裁去老弱残兵，重新招募新兵挑选良将，在军中节衣缩食，为随时抗金做准备。陈俊卿考察到虞允文为可用之人，乾道五年（1169年），推举虞允文入朝为枢密使。陈俊卿在推举贤能的同时还公开反对佞臣。《宋史·陈俊卿传》中提到“孝宗志恢复，特任张浚，俊卿斥奸党，明公道，以为之佐。泊居巾书，知无不为，言无不尽，盖其立志一以先哲为法，非他相可拟也”。曾觌、龙大渊二人学识浅薄，擅长谄媚逢迎，他们在朝中为官时公然索贿，卖官鬻爵，拉

